

抗日民主人士郎占选

●李翔宇 李晓娜



郎占选，男，汉族，汝州市大峪镇棉花村人。出生在1880年前后，1954年因病去世。他是当时汝州、登封、禹州一带有名的煤老板，出资创办了“通山窑”戏剧班，为汝州地方戏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是大峪地区的开明进步人士，积极为八路军提供住所，筹集军粮，协调地方关系，为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队在大峪地区迅速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创立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郎占选精于煤矿勘测，有“活老君”之称，在汝州、登封一带的大小煤矿颇有声望，无人不晓。1920年，郎占选联络

各个煤矿，组建“南北山通山窑太乙班”（简称“通山窑”），自做戏主，以唱“下路调”“南阳梆子”为主。首任班主是张画眉。汝州解放前后达到鼎盛时期，阵容强大，行当齐全，名演员荟萃，个个演技高超，享有盛誉。建国初期，“通山窑”被改为临汝县剧团。

郎占选因开煤矿起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富户、大户，家有良田300多亩。他虽富甲一方，但他为人义气豪爽，敢作敢为，从不欺压百姓。他曾经对村民说，“谁敢欺负你们，就来找我！”各路土匪、越将，一听说郎占选的名字，都让三分，不敢到棉花村胡作非为。

1944年10月初，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队进入棉花村。因部队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侵扰群众，买卖公平，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欢迎。作为当地著名的开明人士，郎占选给皮徐支队提供了很大帮助。他把家里的房子腾出来供部队首长使用，并帮助部队购买粮草，解决困难。

1944年10月中旬，皮徐支队领导在

棉花窑郎占选家里召开了建立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筹备会议。皮定均司令员和其部下35团团团长王诚汉，以及欧阳景荣、党峰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临汝县抗日民主政府，党峰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张清杰任县委副书记兼秘书。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大峪区抗日委员会和大峪区政府，李本任区委书记，董逢甲任政府区长。会上，由董逢甲起草、书写成立抗日县政府布告。

会议结束后，皮定均等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去大峪店召开县政府和区政府成立大会。但是大峪店地主武装头目李聚五，带人在蜜腊山南脚（角）把守，不让八路军通过，他们距棉花窑只有2里多路，不时向八路军开枪威胁。为了顺利通过，领导派郎占选同对方说和。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李聚五仍是不让他们通过。当时，王诚汉团长带领的部队在山下石窑沟（距敌人只有几十步远）等火了，他将自己穿的小皮袄脱下往旁边一掷，一声未吭，一

枪未发，全团人员跟着他往山上猛冲，李聚五见势不妙，连大峪店也未敢回，顺着石板河一直跑到山下一五张村敌占区去了。

这部部队住在大峪店，第二天上午，在大峪店召开地方绅士保甲长及群众大会，宣告临汝县抗日政府和临汝县抗日政府的成立，党峰同志任县长，董逢甲为区长，王金柱、孔庆祥任区财粮助理。县政府和区政府宣布成立后，驻扎在大峪店李家大院达一个多月。后来迁往黄窑和马鞍窑村。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立后，于培周被选为临汝县抗日民主救国会主任，郎占选当选为副主任，为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他的大孙子郎富山也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1954年他在广西、云南剿匪时，郎占选因病去世，享年70多岁。他的大孙子因在前线剿匪，没能见他爷爷最后一面。

（该文根据2018年3月26日与李聚升、郎西强等人的座谈笔录及有关历史资料整理而成）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生态红线的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而且我们设想的其他生态环境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要精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列入后全党全国就要一体遵行，决不能逾越。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5月24日）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我看，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5月24日）

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我这里说的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真抓就要这样抓，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不能把一个地方环境搞得稀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常，不负任何责任。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都要把这个事情落实好。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5月24日）

从制度上来说，我们要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5月24日）

要健全入海污染总量控制制度，从源头上有效控制陆源污染物入海排放。要完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坚决把好环评关口，杜绝严重损害海洋环境的项目上马。要尽快制定海岸线保护利用规划，从严控制围填海项目，保护滨海湿地，严肃查处边申请、边审批、边施工的“三边工程”以及化整为零、越权审批的做法。要加快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开展海洋修复工程，推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完善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7月30日）



·连载·

很多专家学者被习近平同志的诚意所打动，欣然前往正定担任顾问，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做工作。这些专家当中，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家潘承孝、食品专家杜子端等人。其中，华罗庚和于光远两位先生我在正定都见过。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能把这样的大专家请到正定来，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是非常不简单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的“人才经”，确实给正定发展带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他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为？

何戟：习近平同志主政正定期间，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两大政策。

首先是确立正定县的定位。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与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讨论请教，把正定的经济模式定位为“半城郊型”经济，这里既有城市的味道，也有农村的味道。因此，不能光打粮食，也不能只搞城市经济，而是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针对石家庄等大城市的需求，习近平同志总结了这样一个二十字方针：“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当时中国北方，相对于南方，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南方那么开放，甚至有很多人反对搞商品经济，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放开搞活会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弄垮了。那个时候，中央对沿海开放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还没做出明确决定。但是习近平同志已经先行一步，他所总结的二十字方针，完全是根据商品经济规律提出来的：城市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生产什么，不能盲目生产。

其次是全面规划发展商品经济。正定这座古城，与石家庄、唐山、北京等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形成一个北斗七星的样子。习近平同志认为，正定不仅仅要依托石家庄，而且要使正定的农、工、商为包括正定在内的七座城市服务，紧紧跟上大城市的供应需求。这样，生产就得讲科学。在普及科学生产方面，很多具体事情他都亲自抓。我在正定调查期间，正好遇到他亲自监督整改农村“猪圈连茅厕”，把猪圈和厕所隔开，使养殖更加科学和卫生。那正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穿着军大衣，走村串户去督促检查。

关于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四条原则，就是：农村要为城市服务，城市要带动农村；农村要供应城市，城市要帮助农村；农村要支援城市，城市要发展农村；农村要依托城市，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城市，也不能把农村完全拴到城市上。

为了让正定的副食品供应大城市，他没少去推销。那个时候，北京严格限制外地汽车进京，也不让农民随便进城卖东西。他跑了不少地方，促成一些单位与正定形成长期的供应合作关系，正定的货车也由此取得了进京证。这样，正定的猪肉、鸡蛋、生鸡、水果等等，就可以直接用卡车拉进北京，带动了正定农业的发展。

习近平同志当时其他很多思路、举措和具体做的事情，我是通过调查和了解得知的，而上述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采访组：何老，据我们了解，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非常注意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您对他的考察也一定包括这些方面吧？

何戟：考察干部当然是全面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县委书记，对正定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端正作风教育一直紧紧抓在手上。为了规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他提出六项规定，要求干部必须遵守。这就是：总揽全局，抓大事；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

（未完待续）



十月初一炸油馍

农历十月初一，是有名儿的“鬼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炸油馍。其实，人们要炸油馍不是真正的油馍，是个人的同音。

据说明朝时，汝州城南关有家姓滕的孤儿寡母，家里很穷，老娘成天给人家纺花，有时给人家洗洗缝缝，挣几个钱贴补家用。孩子小干不动体力活，天天出去拾柴禾。孩子拾柴禾总打土地庙那儿过，里头是学堂，他总在屋子外头听先生讲书。日子长了，先生问他：“我看你总来听人家念书，你咋不上学哩？”孩子说：“俺家太穷了，上不起。”先生看他长得挺机灵，说：“想上学就来吧，我不问你钱！”孩子回家对娘一说，娘也犯难了，说：“咱家穷，人家先生心肠好不收钱，那你要上学，可得争口气，以后有出头之日，再谢承人家！”

这孩子聪明过人，啥书一读就会，该读的书读完，人也长大了，皇上开科，进京考中了。皇上封他为侍郎，人都叫他滕侍郎。

滕侍郎是穷出身，格外心疼老百姓，办事公道，朝里朝外都说他是清官儿。皇上念他保朝有功，就赏他一匹快马，叫他跑马三天圈地，圈住的地都归他名下。滕侍郎领了圣旨，心想：好马跑上三天，圈住的都归我管，那得有多少人没家可归呀？可又不能抗旨不遵。他骑上快马，回到老家汝州，围着汝州城城壕跑了一天，只占了一条城壕。

有一年秋天，皇上没事找事儿，传旨叫大臣各自回个乡选取大萝卜上殿比赛。陕西有个大臣叫尤莫，领旨还乡，选俩最大的萝卜，让牲口驮着进了京城。

滕侍郎不慌不忙，回到汝州老家，专拣了几根油菜根充当萝卜，准备妥当赶往京里。

亮宝这一天到了，各大臣都献上各自选出来的萝卜叫皇上看，结果，数陕西萝卜最大，河南萝卜最小，皇上不愿意了，就问：“河南萝卜为什么这么小？”滕侍郎说：“万岁不知，臣这是拣最大的送来了！万岁肯定听说过河南地薄人穷，俺家汝州那地方更是寸草不生。河南年年粮粮重，汝州的老百姓可真难熬。陕西地肥，

和河南是邻居，万岁能不能把河南粮粮挪到陕西些？”

皇上听滕侍郎说得在理，就想答复。陕西大臣尤莫慌了，他赶紧跪下，说：“启禀万岁，河南地薄人稠，何不叫百姓外迁，不产粮食，把河南作为专放骏马之地！请万岁准奏！”

皇上还没搭腔，滕侍郎也跪下说：“启奏万岁，小人的话不能听！谁不知汝州地面上毒虫多，怎么能在哪儿做牧马之地？”皇上问：“有啥毒虫，你说来听听！”滕侍郎说：“为臣随身带着几件，请万岁过目。”

滕侍郎取出几个小匣子，一个一个摆开。打开一个小匣子，只听“吱”一声尖叫，飞走了，是个蝉；又打开一个匣子，里头“呼”一下子蹦出个蛤蟆，“哇”一声叫唤，肚子一鼓一鼓的；最后，滕侍郎又打开一个小匣子里头是个大蝎子。他有意叫皇上领教领教，就对皇上说：“万岁，前面放出去那些都是毒性大的，不敢让皇上看，怕伤着您。这个小东西，前头俩钳子里头是毒汁儿，不敢惹，您要是胆大，摸下头的小尾巴就知道了。”皇上是一好奇，二是怕人小看，他就弯腰一摸，一瞬间皇上觉得钻心疼，话儿也说不成了。

滕侍郎乘机对皇上说：“万岁，滋味儿不好受吧？汝州这类毒虫多得很，您看牧羊养马这事儿……”皇上不等滕侍郎说完，疼得又是甩手，又是摇头，滕侍郎见了，就说：“谢万岁开恩！”

打那儿开始，河南的粮粮就挪到了陕西。尤莫气得不得了，就叫陕西的百姓，在十月一日“鬼节”这天，炸“侍郎儿”咒滕侍郎，出出心里憋的闷气儿。

河南的百姓听说这事儿后，也抱打不平，同在“鬼节”这一天炸“尤莫”回奉他。年代久了，成了风俗，音也念转了，就成了眼下说的油馍。

讲述者：刘中兴
整理者：刘选民

汝州非遗项目 手工糖画



传承人王红娃展示糖画技艺（资料图）

糖画，顾名思义，就是以糖做成的画。它亦糖亦画，可观可食。糖画，又称“糖影儿”“糖饼儿”“转糖”，相传它是在古代“糖丞相”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据褚人获《坚瓠集》载，明俗新年祀神，要溶就糖霜，印铸成各种动物和人物作为祭品，因所铸人物形象俨然文臣武将，又以文官居多，故而时下戏称为“糖丞相”。后来，民间艺人在此基础上改进工艺，汲取传统皮影的制作特征及雕刻技法，不用印铸模具，而改为直接操小铜勺，舀糖液绘出皮影图案，这样，民间艺术“倒糖影”就此诞生了。

到了清代，糖画更加流行，制作技艺日趋精妙，题材也更加广泛，多为龙、凤、鱼、猴等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糖画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孩子们的喜爱。如今，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糖画艺术也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型的文化、旅游和经贸活动中。糖画，这种小小的民间传统艺术，正向世人展现其不凡的魅力。

2016年“手工糖画”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红娃、赵延利、刘晶、李喜成。

刚鑫雨 杜宏伟